

## 迷惘的未來：新生代農民工的處境

沈朋達

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生

改革開放初期，第一代的農民工因為低廉勞力成本的優勢，將「打工」做為副業，短暫性的到沿海城市打工。通常這些農民工在存夠了為特定目的（如：修房、結婚等）準備的錢後，便會再回到農村裡務農。因此，「刻苦耐勞、出外打工貼補家用、在家鄉的經濟狀況相對較好」這些概念，應該是一般人對「農民工」一詞普遍的想像。

然而近年來中國沿海的工廠出現普遍的缺工潮，再加上 2010 年富士康的「連環跳」事件，甚至有人以「草莓族」的概念來形容新一代的農民工，認為他們不易管理、抗壓性不如上一代，並以此推測中國「世界工廠」的地位將因此而有所動搖，甚至有被取代的危機。究竟新一代農民工

的生活樣貌為何？他們和上一代農民工之間的差異又是如何出現的？農民工在中國經濟快速成長過程中，又面臨了怎麼樣的處境？

### 受到打壓的勞工團體

這次在深圳市寶安區龍華鎮，我們透過了「○○社區團隊」（化名）接觸到了幾位農民工，也和團隊的工作人員座談，對目前深圳地區農民工的樣貌有了進一步的了解。

「○○社區團隊」並非這個團隊的正式名稱。以往在中國〈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〉的規定下，社會團體必須先找到主管機關並得到其支持，成為掛靠單位，才能向民政機關註冊登記，

而近年來廣東省在省委書記汪洋的推動下，發展「創新社會管理」的政策，對於註冊制度有所放寬，除非特殊情況，否則社會團體都可以向民政單位直接註冊登記。然而因為地方政府對勞資議題特別敏感，對於「勞工團體」的控管絲毫沒有放鬆，再加上當時中共「十八大」將屆，地方政府對於部分的勞工團體嚴加打壓，甚至是強行關閉。因此，作為新興勞工團體的「○○社區團隊」並未向政府註冊，也沒有正式的名稱，僅



規劃完善的硬體設備，和「關外」的龍華形成強烈對比。

以「○○社區團隊」這個名稱做為慣稱。

## 新一代農民工的迷惘

小陳（化名）是一位 23 歲的富士康工人，老家在湖南的農村，到富士康工作剛滿半年。初次見到小陳時，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沉默，而且帶點距離感。或許怕為自己惹來麻煩，每當我們問起和工廠、工作有關的問題，他都會表現出不耐煩的樣子，並且不太願意回答。小陳初中畢業後就沒有再升學了，但他從去年才開始出外打工，他笑著說自己以前在老家是個小混混，沒有穩定的工作，喜歡到處閒晃，直到年紀稍長才覺得自己仍向家裡伸手要錢是一件很羞愧的事，因此開始興起了找工作的念頭。因為湖南鄉村的老家沒有太多工作機會，小陳在「掙錢」、順便「開開眼界」的想法下，2011 年決定到廣東打工。當時他抱持著很天真的念頭：「出來打工兩三年，掙夠錢了回家做生意」。

但到了東莞打工後，才發現打工掙錢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。小陳說以現在在富士康工作為例，雖然工廠有提供宿舍和三餐，但在深圳生活的開銷不小，普工一個月約 2500 至 3000 元人民幣的薪資，扣除林林總總的消費開支很快就花完了，根本沒有辦法儲蓄或是寄錢回老家。

小陳告訴我們，他在打工過程中深刻地體會到，這一代農民工僅靠打工是看不到未來的。一來是中國經濟發展後，快速提高了各地的生活水平，因此在外地掙錢回家鄉創業的可能性越來越小；二來是工廠中普工的工作基本上不具專業技能，對於將來要轉職、創業都沒有任何幫助。最後是學歷的問題，在富士康這類大工廠中，普遍是重視學歷的，如果沒有大專以上的學歷，基本上很難在工作中獲得升遷。

眼看小陳對於「打工生活」的失望，我們問他為何不乾脆回老家？小陳回答：「老家缺乏工作機會，唯一的機會是務農，但務農一年頂多掙個 3000 元，不是年輕人該做的事，父母也不答應，所以只剩下出外打工一條路。」然而這條路卻也讓他感到失望與挫折。



深圳市中心少年宮旁，上百名的市民跳健身舞。

當我們問小陳未來的夢想是什麼？小陳無奈地說：「說自己沒有夢想是不可能的，但衡量一下自己的地位跟處境，談夢想已經太不切實際了。」對於打算在富士康工作多久？未來想從事什麼行業？什麼時候回鄉成家？小陳說：「我沒有任何的規劃，也不敢想太多，現在只希望能夠暫時在深圳生活下去，將來抓住一個機會，能夠就此翻身。」但究竟所謂的「機會」具體是什麼？小陳搖搖頭，說他真的不知道。在小陳身上，我看到了這一代農民工面對未來的迷惘與徬徨。

## 農民工世代間的差異

從我們這次的接觸與觀察中，發現了小陳這一代的年輕農民工，和他們父輩的「第一代農民工」之間存在一些差異。

首先，是打工性質的差別。正如前述，改革開放初期的第一代農民工通常具有務農經驗，甚至以務農為「主業」，到沿海打工經常是為了特定目的而存錢的「副業」，打工通常是階段性的。即使不再以務農為「主業」，通常家鄉的家人仍以務農維生，使農業能成為農民工「再生產」的途徑。但現今大多數的農民工並沒有務農經驗，甚至不是在農村中成長，對他們來說外出「打工」不再是一種有選擇下的「副業」，而是不得不做的、沒有選擇下的「主業」。其次，是大眾媒介



富士康宿舍一樓的 3C 產品量販店，工人聚集在展示電視前看連續劇。

的發達程度。新一代的農民工自小生活在大眾媒介發達的環境，對於世界的了解程度較父執輩強；相對的，大眾媒介所頌讚的現代化城市、物質消費的風潮，也構成了他們對理想生活的想像與嚮往。這些共同促成了新一代農民工出外打工的誘因，也提高了他們對「理想生活」的衡量標準。

最後是消費文化的興盛。當我們造訪富士康龍華廠的宿舍時，發現和原先想像中戒備森嚴的樣貌有很大差別，宿舍的外型和台灣新落成的國宅有點類似，一樓主要是商店街，商店街中除了日常用品百貨外，最多的是 3C 用品店、手機店和首飾店，隨處可見穿梭其中消費的工人們。新一代農民工的成長背景，正好碰上改革開放後經濟市場化的風潮，消費不再是一種政治不正確，加上大眾媒介對消費文化的推波助瀾，使得新一代農民工在城市打工過程中，以消費的行為建構、追逐他們對現代化、城市化生活的想像。

以上這些差別，使新一代農民工到城市打工的誘因和上一代大大不同，新一代農民工對農村的認同感較低，他們所嚮往的是現代化的城市生活，到城市打工不再只是一種「手段」，甚至成爲一種「目的」。

## 農民工的困境

然而在現實上，農民工卻無法在城市中定居下來，這主要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：工資與戶口制度。在工資方面，平心而論，富士康的工資與福利比其他鄰近的工廠好，但衡量工資的標準應該是以「維持勞動力再生產」爲基準，也就是說，一份工資不僅是維持工人本身的生存，更應該維持扶養子女、父母的家庭開支，以及抵禦未來的發展和風險。而中國工廠的工資，普遍只能支應工人自己在城市生存的水準，不足以負擔家庭開支，使得農民工的家庭扶養問題相當棘手。

其次，是戶口制度的因素。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，利用了農村大量且低成本的剩餘勞力發展城市的經濟，然而受到市場化經濟的影響，今日的農村已不再是「自給自足」的體系了，出外打工成爲大量農民工的「主業」。農民工爲打工所在的城市創造經濟成長，但卻礙於戶口制度的規定，無法享有城市的住房、醫療、教育等福利，這大大限制了農民工於城市定居的可能性。

如果說經濟發展的「中國模式」是存在的，那農民工絕對是「中國模式」成功的大功臣之一。自改革開放至今，農民工一直爲出口導向的工廠提供了低廉的勞動力，但隨著農村生產力的下降，出外打工幾乎已成爲農民工唯一的選擇，持續低廉的工資和僵化的戶口制度，共同造成農民工難以在城市中長久定居，也限制了他們未來發展的可能。因此有人便稱：農民工目前的處境是背負了「新的三座大山」：回不了的家鄉、定居不了的城市、決定不了的未來。<sup>1</sup>在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今天，新一代農民工對於自己的未來，卻是越來越迷惘。

如果說經濟發展的「中國模式」是存在的，那農民工絕對是「中國模式」成功的大功臣之一。自改革開放至今，農民工一直爲出口導向的工廠提供了低廉的勞動力，但隨著農村生產力的下降，出外打工幾乎已成爲農民工唯一的選擇，持續低廉的工資和僵化的戶口制度，共同造成農民工難以在城市中長久定居，也限制了他們未來發展的可能。因此有人便稱：農民工目前的處境是背負了「新的三座大山」：回不了的家鄉、定居不了的城市、決定不了的未來。<sup>1</sup>在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今天，新一代農民工對於自己的未來，卻是越來越迷惘。

1 隋慧(2012)〈發展決定新工人的命運〉。《南風窗雜誌》22: 10。